

心路历程

许倬云  
著

# 心略历程

许倬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路历程**/许倬云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15-5822-5

I. ①心… II. ①许…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194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经北京麦士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授予厦门大学出版社有限贵任公司独家出版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本书限于中国内地发行。

版权登记图字:13-2015-050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60 1/32 印张:6.875

字数:118 千字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台湾传记文学社通知我,《心路历程》简字本的版权,已经转移给厦门大学出版社。而且,传记文学社也传达了厦门大学出版社的讯息,要我为这一新的版本写一篇短序。

《心路历程》初版是1965年,到现在50年了,一本小书在出版50年后,居然还可以再版,对于作者而言,当然是很欣喜之事。尤其,因为我在鼓浪屿出生,战后也曾在厦门短期居住,这本书在厦门再版,当然更是令我感到温馨。

《心路历程》的初版,是在《文星》社出版,收集了我在1962、1963年间刊载于报章上的一些零散散文。今天回顾50年前,当时台湾的学术与文化风气,依然犹在目前。1962年,我从美国研究所读完书,回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在我1957年离台时,台湾的经济还是非常窘迫,学术界的同仁,生活非常艰苦,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5年之后回来,台湾竟然已是另外一番面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至少大家已经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从1949年两岸

分隔以后，台湾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可是，当时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耕者有其田和乡镇长、地方议员的民选，经过10年酝酿，已经有了可喜的后果，也奠下了此后经济发展继长增高和政治逐渐民主化的基础。

在这个时候，“戒严”时期的种种约束，依然存在，所以还有“白色恐怖”。然而，大家已经开始在憧憬未来如何发展。尤其学术界中我的同辈，一方面感觉有机会好好作研究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文化的发展，此时不重新起步，更待何时？我的一批朋友们，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台大和政大的教学同仁，包括胡佛、杨国枢、李亦园等人，已经经常聚会，组织了一个同仁刊物《思与言》，在1963年出版了第1卷。我回台后，他们要我参加《思与言》，经过大家的商量，我们决定将《思与言》改组为一个学术团体“思与言社”，一方面出版杂志，一方面也经常彼此激荡，讨论共同关心的课题。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我被选为第一任的主席，定下了“思与言社”的会章和《思与言》杂志的编辑方针。因此，那几年，我在报章刊布的文章，都和《思与言》的宗旨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当时构想，两个方面：在文化方面，我们要赶上“现代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应当立足于如何使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内，而不是抱残守缺，一味地自夸中国文化的优点，也不是如同“五四”初期那样，将中国文

化贬得一文不值。我如此想法,就是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看到了美国代表的现代文化,有其优点,所以造成了300年来的辉煌成就;也有其弱点,以至于到今天,必须要有一些修正和改变。我当时觉得,台湾文化既有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特殊风格,也是广泛地蒙受了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台湾必须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也必须检讨占据世界主流的现代文明。

在学术研究方面,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没有为台湾打下学术研究的基础。日本的学者在台湾少数几个大学内,都只作专精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风气,没有在台湾留下可以发展的基础。大陆来台学术界人士,总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在自己的专业有深厚的学养,却很少有人熟悉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学术研究零碎化的情况下,台湾的学术发展,或有自我设限的困境。台湾学界对于“科学”二字,颇有“科学主义”的误解。凡此,在这些散文中,我常常表示担心。

当时,《思与言》的同仁们,无可讳言,对于当局在“戒严”时期的作为,有相当的不满,而且大家也深切地盼望,台湾会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方向。我们总以为,过去中国数十年来的发展,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时,并没有真正深切地剖析和评定这些西方文化精粹内在的长短和优劣。尤其在政治制度方面,一般社会大众,还是以

为只要建立了民选制度，民主就实现了，只要有了法律保障，自由也就落实了。这种观念上的误区，是在“五四”以来，启蒙思想时代留下的缺陷。所以《思与言》的同仁们，经常比较各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共同认为，彻底的“革命”往往带来破坏，大于建设。所以，我们向往英国式的逐渐改革，“费边社”的传统，成为我们讨论的口头禅。英国式的内阁制，比总统制更不能规避责任，也较少政府集权的可能。我们也经常讨论到：民主，不是在多数压倒少数，而是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经过协调，取得折衷，以满足最大多数选民的需求。民主不是冲突，更不是对抗，而是协商。我们也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是在个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个人的自由，也不应当高于个人的责任；自由和公平，都应当顾全。那些认真的思考，在《心路历程》中，占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比例——今天回顾，似乎那时顾虑到，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病，今天居然都陆续出现了。

在当时的台湾，虽然文网有所禁忌，还是有一些杂志和报刊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文星》尤其是当时大家喜爱的读物，不过《文星》的投稿者，各有各的志趣，《文星》本身的好处在于能容纳不同的意见。《思与言》的作风，则是一群同志，围绕着共同关心的话题，个别提出自己的想法，将一个小杂志当作我们自己的论坛。五十多年了，

《思与言》还存在,而且,今天的《思与言》仍旧如同我们当时立下的规矩:每年有两位同仁,轮值主持“思与言社”,也承担杂志的编辑事务。这一传统,可以防止一个杂志为少数人掌握,而失去了团体共同运作的传统。

顺便提一个闲话:我为了筹措《思与言》第2卷第1期的出版经费,“卖青苗”,将《心路历程》预售给《文星》的萧孟能先生,将那2000块预支的稿酬,出版了《思与言》。今日回想,犹如昨日。忆念故人,萧先生已经抱恨逝世,思之怆然。

许倬云

2014年7月30日



这一本小册子，是一些杂文集合。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评论性的文字，一类是自传性的小文，一类是书评。除去附录在《科学工艺与国情》后面的一篇书评外，都是这两两年来的作品，其中有些已经发表过，有两篇则还没有发表。×××先生已催了我多次，要把这些小文集成册，我一直踌躇未敢应承，一方面固然为了字数似乎还不够多，内容又多重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胆怯，我不是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自己的专业是研究与教书，习惯上往往为了求意义的准确而牺牲了对辞藻的修饰，陆续发表的小文，又多在几位编者催促下草成。急就章，哪里能谈得到字句的洗冶锤炼！然而，我知道至少我在这几篇杂文里提出了一些这一个世代中国青年遭遇的问题。我未必给出了有用的答案，这些问题却的确困扰着我们，尽管这里的短文未必有任何文艺价值，至少是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

1957年，我搭乘了56天船负笈东渡太平洋，当时我对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抱着自豪自满的心情，满以为

回国时仍能看见同样的中国。到美后,也只想着把本行功课学些门径。逐渐,由于友人的影响,也由于自己对社会学的兴趣,我开始把观察美国社会及分析美国文化,作为本行史学工作以外的主要兴趣。于是我才看到了美国成长的力量及维系的力量是对个人的尊重,由尊重个人发展成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和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由这两点,又推演出反对独断的理性主义,及反对权威强加约束的自由思想。美国的开国贤哲在开国的各种文献上字斟句酌,唯恐一字之差造成后世的祸根。历来大法官的裁决也几乎篇篇为不容侵犯的人权做注脚。

这种独往独来,要与天比高的个人精神,造成美国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也造成他们不诿过、不逃避的负责观念。一批又一批,一州又一州,向西方开拓的人群,用篷车碾过高山,碾过沙漠,直碾到西方的海岸,用犁头犁开了终古未辟的沃壤,也用锄头在岩缝里掘出了一小袋一小袋的黄金。

新教伦理强调个人的成就,把个人在今世的成就看作上帝恩惠的证明。因此,美国多的是自求多福的进取者。虽然真正能够做到“从木屋到总统”的人寥寥无几,“从侍童到董事长”的也屈指可数,依然无碍于他们以此为梦想的方向,努力鹊起。

人人自求多福,结果作为许多个人集合体的美国社

会也跟着有了最富最强的地位。起初却并未曾有总目标、总路线一类的制定，只是天高任鸟飞，海阔让鱼跃，放任大家争奇斗胜，各逞本领而已。

逮及近世，美国工业化踏进了细度分工及大量生产的阶段，由此产生了成品标准化。又为了工业的专门及集中，人口遂群聚于少数巨型都市。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又使全国贫富的差别相对地减少到比以无阶级为号召的共产社会还要小。工艺技术的成就加上企业管理的组织，大众传播工具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一个电视节目，在西岸的观众与在极东南部的观众可以同时收看；而同一个专栏作家的评论也往往同时出现在几千家大小报纸上。当年秦始皇只做到车同轨，书同文，希特勒与斯大林徒然梦想要用强力使全国思想一致，而美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竟几乎走上了这种近乎梦寐以求。求之未得的境界。若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奥威尔和赫胥黎描述的新天地，只怕真要在1984年左右出现，宁非人类的悲剧！

更糟者，美国人民今天已经沾沾自喜，很多人满足于自己已获得的地位、已获得的享受，觉得大可就此安乐一生。我最近对一群美国教授作过一次小小的非正式调查。这二十几位教授来自全美各地域，年龄分布自52岁到29岁不等，因此他们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得到的

结果很令我气短，大率言之，比较年轻的几个都倾向于少研究，多过家庭生活，多享享福，几个比较年长的倒还注意研究，认为研究工作之中自有无比的乐趣。另一方面，这些教授中自认只是知识分子的，大半是年长的几位；而自认是职业性教员及职业性专家的，大半属于比较年轻的几位。由于他们大都来自小型学院，很多人从不曾长期离家，土著性很高，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地域代表性。结果显示，来自农业地区的教授们比较倾向于以知识分子自居，来自工业区的教授们很多倾向于以教书为一种专家职业的看法。

从这些对比看来，我们可以将他们粗粗归纳为两类型：年长的及来自农业区的人自认不过是知识分子之一，因此倒还认为对知识的追寻本身具有意义；另一类是年轻的及来自工业化地区的人，自认是专门人才，追求知识的热诚逊于获取物质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安乐。换句话说，越是在高度工业化环境中的人，个性越是泯灭，越是把自己当作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人成为螺丝钉，一个大螺丝钉大约很少能有抗拒拆下重装另一钉孔的勇气吧！

一个最重个人尊严的传统，发展至极，竟成为这样一个局面，能不说是悲剧？幸而，美国还是一个重自由、反对干涉的社会。另一方面，工业化及工艺技术的进步，固

然造成了上面一节所说的现象，也改善了生活。今天的美国，在路上冻馁倒毙的人数，少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及人类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由这一点意义来说，美国人似乎是比较有些活下去的保障，不仅活下去，他们的工余时间还在不断地增加。大多数人并不如何重视工作后的余暇，大都把时间打发在享乐活动上。但是，也有不少人可以善于利用余暇，做创造性的活动及心智活动。他们可以有可能会接触多种多样的思想，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中，自由选择自己的出路。禅宗思想及欧陆存在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间的普及，未始不是为了寻求自己，要把自己从大机器中拖出来，而工余的闲暇和大量书籍的廉价倾销，也使一般人买得起禅宗书，买得起存在主义小说，同时有时间去阅读，去思索。这些能够深思的人，也许就是挽救工业化前述弊病的种子。

两年前初返台湾，发现阔别 5 年的台湾与前大不相同了。从道路设施及日用品的供应看，我们纵然离工业化起飞犹属有待，至少已经驶进了跑道，工业化将是无可避免的事，而且也正是我们努力以赴的事。美国工业化对于个人价值的后果已如前述，我甫从那里归来，记忆犹新，对于将来我们自己的发展趋向，不能不怵然心惊。

我并不想象中国永远停在工业化的门槛外面，那是不可能的事。反过来，我以十二万分的期待，祝祷着工业

化早日光降中国。工业化,大约是唯一可以喂饱我们庞大人口的途径。若是许多人在饥饿边缘,或者辛劳终日,刚够果腹,那些口嚷精神文明的少数人,根本就是残酷地说些风凉话而已。颜子可以一葫芦冷水加上一便当冷饭,照旧自得其乐,但是颜子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像他一样自得其乐,日子过得不错的孔子和子贡更不配叫别人只为了颜子的乐,也一天只吃一便当冷饭。

要让人人吃得饱,工业化是一条最好的途径。

美国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有成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国人在工业化过程中“走火入魔”,把人转换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殷鉴,前车之覆,正好是我们应该细细检讨自己辙痕的时候。我这两年来写的杂评大多是针对着这两点而作,一方面找一找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绊脚石,一方面找一找绕过陷坑的另一蹊径。

我总觉得,中国社会受人际关系网络的约束太久了,中国人不容易从这个网络中脱出来。三纲五常,把一个人压在祖宗与子孙之间,挤在各式各样特定关系之间,这个“我”变成诸般线条的交点,像欧氏几何学上的点一般,自身的空间和重量完全不存在。甚至中国人心目中的个人成就,也是为了与自己有关的别人。中国的牧猪小儿可以一旦中试而成为公卿,正如同美国人可以梦想由木屋到白宫一样,但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状元郎,一说

到动机就是光宗耀祖，我很少听说过赶考是为了满足一己心智活动的人。连梁山的好汉，盼望招安时，也只盼博取功名，可以“封妻荫子”。

若是单纯地舍己为人，不分为的是谁，这是佛陀胸襟、耶稣精神，我无闲言。若是为“人”而有大小圈子之分，即孟子所谓爱有差等，原也是人情之常。不过，若是各层圈子的等差化，盖过了一切其他考虑，则每个人势难公平地对待四周围的别人。工业化的环境必须是合理的交易与管理，先天上就不能与过分强固的圈子主义协调。

再从工业化泯灭个性的一个角度看，由于中国人久已习惯于个人的自我否定，久已习惯于置身在大网络中，我非常担心中国人能否抗拒工业化把整个社会转变为大机器时，个人转变成螺丝钉的命运。也许，在美国花了50年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竟还不需要如此久。

为了抵制这个危机，我在这两年的小文章上，不止一次提出中国过去传统中原有的个人尊严。在我看来，为了义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志节，原就是对于独立人格的歌颂，揭出一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气概。我认为，“忠”就是承认自己的价值，“恕”就是承认任何他人的价值。人为天地之心，则更发展为“三才”的说法。假如我们在这些地方找答案，也许我们能自己

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格，不仅能抗拒工业化把社会作为大机器，也能抗拒任何要把个人纳入组织的意图。

单是这一套答案是不够的，我只是提出了自以为是一套答案。为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问题，解决避免覆辙的问题，答案应当有许多许多。我只是在这几篇小文章里，提出了问题，更希望大家一起寻找，各寻各的答案，在诸说并存下，大家各作各的抉择。我不相信天下有一成不变的独木桥，我更不相信天下有可以用道理以外的力量来维持的道理。最大的先知及最后的先知，只存在于宗教领域，不能存在于辩理的领域。

至于几篇自传性的文字原是为了几个特殊的目的而写，例如《我的母亲》是为了做母亲节的礼物，《心路历程》则记述自己心智成长的过程。严格说来，都应该是留作自己玩索的记录。我仍愿把这几篇文字也付梓，一部分原因是用来引玉而抛出的破砖。我们这一个世代，是充满了困惑与迷惘的世代。正在发展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却看见无数不得发展机会的青年。一团低气压，压得许多人想要扯破衣襟，大叫一声以求抒气。为了这种郁闷，我们都看见有一个不耐烦的青年憋不住了。他在求发泄闷气的冲动下，抓住了一些偶像加以咬撕跌打。他获得不少掌声，因为有不少人借着看他的一顿发泄而获得假想自己也发泄过的满足。



我以为,那些被攻讦的偶像本身是时代悲剧的产物,他们身不由己,扮演了若干自己并不想做的角色。犹如堂吉珂德心目中的巨魔,他们只是风车而已,是一些时代错误下的牺牲品。骂倒一些个人,今天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我们要改变的是制度与结构,因此我们要批评观念,建议提出新观念。这一个工作,批评观念的工作,必须平心静气地做去;平心静气,又须先告诉好些“恼怒的青年”,天下的路不止一条。我天生残疾,在童年时,每见别人自由奔驰跳跃,自己却空具一身精力,竟不得施展。我曾为之郁闷,为之烦躁,其心情颇肖今日许多“恼怒青年”的处境。随着年事渐长,我逐渐由这郁闷烦躁中找出一些出路。

我逐渐了解,许多事情不是一厢情愿可以办到。我也逐渐了解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由于自己学步的经验,我知道稳固的改变不是朝夕之间,一蹴可就;只有从现状一点一滴地改革,才可以真正地改善情况。面临困难,接受困难是事实,不放弃希望,而且坚持着应做的做。暴虎冯河,只会僨事;一击不中,便即远扬,也不是成事的样子。因此,我逐渐懂得了“事在人为”,“尽其在我”。

这是一种缓慢的步伐,今天许多青年朋友,没有吃过我身受的残疾之苦,凭着一股勇气,大约会对我上面所说的话嗤之以鼻。但是,对于冲不破郁闷低气压的青年朋